

最感兴趣的，只有写诗和读书交流。大伙儿去五四操场边的“燕春园”喝酒，毕了业挨家聚会，不嫌麻烦。他们谈论着黑格尔、康德，憧憬着但丁的《神曲》，奈何好景不长——1989年3月，海子在秦皇岛山海关卧轨自杀；5月底，骆一禾过世。“骆一禾28岁，海子连25岁都没有。海子选择自杀，骆一禾是生病去世的，突发性脑溢血。骆一禾还是认为人在世上，应该好好地生活。”

大学毕业后，西川去了新华社工作，在全国各地奔波。他第一次感觉到，中国太大了，走也走不完，看也看不完，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风景，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传说、民俗。陕北吕梁旷野里的风，风里断断续续的歌声，山西黄河风陵渡浩浩荡荡的东流水，千米长的铁桥上独他一个人，“你知道，这种时候就有一个强烈的冲击。我在大学里学的东西还是太有限了，做了记者，漂泊社会，不断地在绿皮火车、长途汽车上颠，把我的学生腔全颠没了”。

市场经济的滔天巨浪面前，“文学”一度坠入谷底。“我的东西越写越没人看。别人看不懂，我还是继续写下去。……我的诗好不好，这世上其实只需要四五个人明白就够了。马尔克斯说，作家写作可以获得的最大好处是：一个经过写作训练的头脑，能够一眼认出另一个被写作训练的头脑。”

现在，西川的诗歌早已得到国际文学界的肯定。更难得的是，他始终“行动”着：从写作到翻译，从大学任教带研究生到通过互联网参与视频音频节目，普及诗歌审美。

通过诗歌，我们和世界保持私人的关系，**这是一种有温度的、有弹性的、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关系。**

哔哩哔哩上有《西川的诗歌课》，他如是解读自己的动机和目的：“通过诗歌，我们和世界保持私人的关系，这是一种有温度的、有弹性的、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关系。诗歌充满不稳定、不安与深不见底的幽暗之物，需要读者认真体会，体会的结果，或形成自我审美的革命。对写诗的人来讲，就是推翻过去定型了的自己，推翻那个如果不控制就向庸俗滑过去的自己。”

谓我何求

我们读诗写诗不是因为它好玩。

读诗写诗，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分子，

而人类是充满激情的。

没错，医学、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崇高的追求，足以支撑人的一生。

但诗歌……美丽、浪漫、爱情……

这些才是我们生活的意义。

——《死亡诗社》

20世纪初的中国，前所未有的现代性经验摧枯拉朽般袭来。当旧体诗词的表述方式、词汇体系、情感抒发等已难滋生新的可能，同真实生活间撕裂出愈发明显的鸿沟，汉语诗歌渴求一场变革。

从“诗界革命”时期“我手写我心”的呼吁，到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须言之有物”“去陈词滥调”的主张，“新诗”之“新”，须体现于经验内容和语言方式两方面。坦白讲，探索之路艰难曲折，有目

共睹：第一本新诗诗集《尝试集》青涩乃至幼稚；而中国近现代翻天覆地的历史激荡，也使得诗歌语言频繁地被宏大话语所征用收编；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后期以来，充满先锋精神和西方现代主义色彩的诗歌浪潮注入活力，为今日的汉语诗歌写作奠定根基，然其艰深晦涩处，也在某种程度上排斥了更广义上的理解与对话。综上，人们发现，欲使诗歌真正重回C位，“术”上仰仗手机移动端等新兴传播媒介的助力，“道”上等待汉语新诗自身的成熟壮大——百年摇摇晃晃的反叛、摸索、吸收转换之后，如何在当代语林中树立对当下生活有效言说的参天巨木。

诚然，进入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人们大可以做音乐、拍电影、写戏剧，诗歌似乎只不过是迷花眼的无数“文艺选项”里的一条。但是，这个错彩镂金又千疮百孔的尘世，其实依旧需要诗歌的点缀与抚慰。诗歌是“无用的”，它不能抵挡一把匕首、一颗子弹；它又是“有用的”，足以用来抗衡狂热的煽动、虚无的挫败、现实的荒谬与颓丧，抗衡逼迫我们变得枯燥乏味、变得麻木不仁的一切。

2013年，利物浦大学的研究者就诗歌和散文对于人脑神经元活动的改变做过分析，他们认为，文本越复杂越棘手，大脑语言中心的反应就越强烈，因为它们在试图理解其含义。数年前，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丹尼·W·林格内戈罗（Danny W. Linggongoro）亦撰文，称“医师们渐渐开始明白，在医学中，语言和人性表达的地位突破了那条模糊的边界——医生和病人并非只能